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

茅 盾

作 家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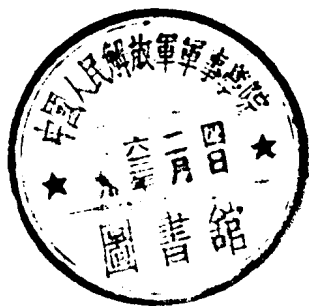


2 037 5532 9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

——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

茅 盾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

书号1611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10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1}{16}$ 插页1

196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精)0001—2000册 (平)00001—14000册

定价(4)0.69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去年九月間，在杭州看了婺劇《臥薪嘗膽》的演出，隨後又知道全國各地的數以百計的劇院和劇團（代表了一打以上的劇種）在去年秋冬乃至今春都以此同一題材編了劇本，並陸續演出。（據文化部《藝術研究通訊》本年第四期一篇報導性的文章，此類劇本共有七十個，尚是不完全的統計，所以我猜度當以百計。）各地報刊上也曾發表過文章，提到春秋末年的這一個歷史事件以及百來種新編的《臥薪嘗膽》中的少數幾種；但是，在熱鬧的歷史劇討論中，卻很少提到這個去年最普遍地演出過而且擁有百來種不同腳本的新編的歷史劇。不提到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第一，這百來個劇本雖然在舞台上演出了，但極大多數卻沒有在報刊上發表；第二，歷史劇討論中反復詰難的是幾個原則性問題，例如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等等，有時引例，也很少提到《臥薪嘗膽》。而對於如何評價歷史人物問題也只在原則上發議論，即使有時聯系到實際，大都集中在一二翻案人物，似乎無暇旁顧。

由於“好奇”，我曾經設法搜集各地各劇種的新編《臥薪嘗膽》腳本，到去年年底，共得五十來種。冬夜抽暇讀之，饒有興趣，然而，問題亦漸漸來了。於是我又到故紙堆中，檢核史料。

二千四百多年前吳越戰爭的史料，本來不多，專書專篇寥寥可數，至多一星期可以看完；如果还想省事，翻翻《東周列國志》的有关吳越戰爭那几回，則半天就看完了。（《東周列國志》藝術價值不高，遠不如《三國志演義》，但在追求“無一事無來歷”這一點上，它是幾乎可以比肩《三國志演義》的。所以，編寫《臥薪嘗膽》的劇本，如想省力，則單單閱讀了《東周列國志》也可以對付了。）但是，史料雖少，問題卻不會少。這和根據這些史料新編的百來個劇本的情況，恰好相反；新編劇本雖有那末多，可是問題卻只有這麼幾個。這篇漫話式的文章，也打算談談我對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事件的看法，和根據歷史怎樣寫文學作品的問題。

這樣，就勢所必然，先要談談史料問題。

一 怎樣甄別史料？

所謂史料，即有人稱之為“歷史生活”的一切文字記錄或口頭傳說。文字記錄有官方的，也有私人的；口頭傳說則全是民間的。考古發掘所得，屬於文字記錄之類。新出土的材料可以審核或補充從古相傳的文字記載，可以訂正文字記載的錯誤；然而也不能認為出土的古器物上的圖畫或文字的史料性是絕對可靠的。制作器物的是私人（而且屬於統治階級的占絕對多數），他的主觀意圖不能不在器物的文字中乃至圖畫上反映出來。至於墓碑、私家傳記等等，其可靠性是相對的，

有时竟很不可靠，这就要对个别具体事物作严格的鉴定，不可一概而论了。

民間的口头傳說常常保存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史料，此在近百年的“历史生活”尤其如此。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吳越历史生活中，我們今天已經无法直接采录这一部分史料。我們今天在民間所能听到的吳越傳說，几乎完全根源于文字記載（即有关吳越两国历史的史籍），而地方志所載則又抄襲了这些史籍和东汉以后一部分的地理志。很难說这些民間傳說是由于有了文字記載而流傳至今或者它們本来面目就是如此的。

我实在淺陋，想不出今天我們来研究吳越当时的“历史生活”除了勘核前人的文字記載，还有什么其它办法。那么，只好暫時埋头于故紙堆中做些功夫了。

任何史料在傳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由于傳写者的主观意图而有所窜改、損失，或增加。这也就是說，一定会打上階級的烙印。过去的史书的編写者既然是为統治階級服务的，当然代表了統治階級的历史观。这是众所周知，无煩絮陈的了。不过，对于記載吳越历史的几本古书，却要个别加以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今所傳最古老的記錄了吳越事件的史书，一是《左傳》，一是《國語》。《左傳》因《春秋》而作，这在当时实在不是官书而是私家著述。但这部私家著述，其观点虽然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其搜輯史料的态度却不能不說是相当客观的。至于《國語》，究竟出自何人之手，至今还是个悬案。班固在《司馬迁列傳》曾說：“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

本事，是以为之傳，又纂異同为国語。”頗有独立見解的会稽人、学者王充亦持同样見解。于是东汉人称《国語》为《春秋外傳》。班固的意見大概来源于司馬迁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語”这句话。但是《左傳》和《国語》文章風格不同，似非出于一人之手；而且《国語》各篇的文章風格亦不尽同，似乎《国語》此书亦非出于一人之手。从班固所称“纂異同为国語”看来，我們不妨設想《国語》的来源是当时各国的官家記錄，而經過左丘明其人（或者不是他）整理过的。但今所傳《国語》还經過刘向的整理。刘向生于《国語》第一編纂者之后約五百年，他和他的儿子都曾在当时的皇家藏書館（天祿閣）做过整理古籍的工作，經過刘向整理的书，他都写个报告給皇帝，（例如《战国策》、《晏子春秋》等等），可是現在找不到他整理《国語》后写的报告，不过給《国語》作注解的韦昭（三国时吳人）則說刘向“于汉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繆”，我們就姑且相信韦昭的話罢。同时，也不妨設想，第一次編写《国語》的作者除了采取当时各国的官家記載，也采取当时的民間口头傳說，因为它和《左傳》比較起来，不但有“異”，而且也多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至于刘向整理古书的态度，如果照他整理《晏子春秋》的方針和方法看来，还是相当謹慎从事的，对原书不随便改窜，也不随便刪汰。

这样說来，我們不能不把《国語》当作比較可靠的史料；因而《国語》的《吳語》、《越語》也就不能不是二千四百余年以后的我們研究吳越关系、評价吳越人物的比較可信的根据。

另外一種比較可靠的史料當然就是《左傳》。這是一部體例謹嚴，記事簡明扼要而又生動多姿的編年史，它的原始材料主要是魯國的官書，大概也採用其他國家的官家記錄。此書相傳是左丘明的著作，大概和《國語》的編寫者是同時代人。只在清朝末年，有人說《左傳》是劉向的兒子劉歆所偽造，但這樣的“懷疑精神”有其主觀目的，即為經今文家張目而推翻經古文家學說。

如上所引述，班固認為“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是以為之傳”：可見《左傳》的觀點和立場就是遵照《春秋》的觀點和立場的。《春秋》是孔子用以表示其政治立場和歷史觀點的書。當然，孔子不會離開當時的封建領主的立場而站到奴隸那邊去。但是，孔子生當社會劇烈變動的春秋時代的後期。當時，奴隸經濟雖仍占主要地位，而生產比較發達的國家如魯國則已有了封建地主經濟制度的萌芽。而世襲的奴隸貴族（各國諸侯）的政權正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受到封建地主貴族（諸侯的卿、大夫和卿、大夫的家臣）的越來越大的威脅。這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這一個內部矛盾有利於奴隸對奴隸主的反抗，當時奴隸的大批逃亡之所以可能，就因為有收容他們的地方；這個“逋逃藪”就是封建地主貴族的領地。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點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矛盾。他一方面主張尊王室，（維護最大的奴隸主的名義上的權威），另一方面卻又贊許封建地主的把奴隸變為半農奴或依附農民的可以提高生產的做法，並且為這些做法“創造”了理論；他一方面極力要保持西周以來的封建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卻又貶責那些

阻碍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暴君，因此，他的《春秋》既笔伐那些乱臣贼子，又以“×人杀×”或“×人立×”等等书法表示对于新兴的封建地主贵族集团的赞许。按照孔子（儒家）的用語，“人”指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其政治上的代表是当时的代表新的经济势力的封建地主贵族；而“民”则指奴隶。《左傳》既依《春秋》而論輯其本事，所以它的記載也代表了当时的前进的政治、经济力量（封建地主贵族阶层）的利益，因而采輯史料，还是比较客观，可以说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生活，特别是在更无較好較可靠的史料的今天情况下，我們还不能撇开《左傳》。因而，我以为《左傳》一书也不能不是今天研究吳、越关系，评价吳、越人物的比較可信的根据。

《左傳》和《國語》所記吳、越两国的关系以及夫差、勾踐，吳、越两方文臣武将的言行，互有詳略。我們是不是可以说：《左傳》和《國語》互相补充，正好构成比較近于完整的吳、越关系的全貌呢？

我想一定有人說：不能。为什么？因为还有司馬迁的《史記》。司馬迁离吳、越时代約四百多年，离《左傳》、《國語》的作者大約也有三百多年。班固說司馬迁作《史記》，据《左氏》、《國語》，采《世本》、《國策》。然而《史記》所載先秦史事有詳于《左傳》、《國語》者，这就只能有两种解釋：一是司馬迁讀过的先秦典籍（包括“档案”性质的各国国史）比《左傳》等书的作者所見者为多；二是司馬迁又广泛地搜集了民間口头傳說。这两个解釋都有点事实基础。其一，司馬迁世世代代做史官，他

的祖先在周宣王以后曾由周而至晋、奔秦、入魏，他的父亲是汉朝的史官，博极群书，他家学渊源，并且由于职位关系，能够看到许多秘笈和“档案”。其二，他二十岁以后就自北而南，足迹遍及那时的天下。可以设想，他不光是游山玩水，他还搜集了许多民间口头传说。但是司马迁对于任何史料（不论是文字记载或口头传说），并不抱盲从态度，并不是无所抉择的。即以《史记》所载吴、越关系及两国君臣的言行而论，有见于《左传》、《国语》而《史记》反而没有的，也有《左传》、《国语》所没有而《史记》则有之的。《史记》所不载者，如吴夫差与晋侯会于黄池正因争先相持不下时忽得谍报越勾践乘虚侵入吴国，夫差镇静地采取了措施，保全了面子；对此，《国语》加以详细的描写，而《史记》则一笔带过。司马迁很推重《国语》，不能说他不熟悉《国语》，因而可知这里的一笔带过，是他故意弃而不取的。司马迁自己特别提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可以设想他曾经采集了那些地方的民间口头传说，包括吴、越两国关系的民间传说，这些就是《左传》、《国语》所没有的资料。班固一方面批评司马迁运用史料“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又说他论学术，论人论事，“是非颇缪于圣人”，然而另一方面，班固又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按扬雄《法言·重黎篇》比较《周官》、《左传》、《史记》三书，称《史记》为“实录”，乃与称《周官》之“立事”，称《左传》之“品藻”比类而言）。如果“实录”也者，可以今语“客观态度”（班固所谓“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者是也）释

之，我以为《史記》确不失为“实录”，而亦因此，故論人論事，“是非頗繆于圣人。”班固所不喜的“是非頗繆于圣人”，在我們看来，正是《史記》的优点。《史記》論事有独立思考精神，記載抱客观态度；就此而言，已不能說它完全为統治階級服务。当然，我們也不能有过高的要求，一定要从这部二千年前的历史著作中找历史唯物主义，而在找不到时，就罵它一錢不值。

这样看来，《史記》里头有关吳、越两国的专篇《吳太伯世家》、《越王勾踐世家》、《伍子胥列傳》，以及《貨殖列傳》有关范蠡、計然的部分，《仲尼弟子列傳》有关子貢的部分，也是我們研究吳、越关系以及对两国君臣的評價不可或缺而且比較可信的材料。

《左傳》等三书都是历史书籍，但除此而外，先秦諸子的著作中也还有不少关于吳、越的故事，以及他們（諸子）对于吳、越君臣的評價。对此，我在下面将用专章討論。現在先談談东汉人編写的两部专门記載吳、越关系的历史，这就是《吳越春秋》和《越絕书》。

先談《吳越春秋》。这是东汉赵曄所作，赵是越（会稽、山阴）人，《后汉书·儒林傳》有赵傳，說他治韓詩二十余年，著作有《吳越春秋》、《詩細》、《历神淵》；蔡邕很欽佩《詩細》，认为胜于《論衡》（王充著，王又是一个会稽人）。《隋书經籍志》著录《吳越春秋》十二卷，今本（据元大德刊本）只有十卷；《文选注》、《水經注》、《太平御覽》等书引《吳越春秋》，今本无之，也許就出在逸去的两卷中。（从这些逸文看来，逸去的两卷都沒

有太大的史料价值。)此书虽說是吳、越两国的历史,但重点仍在吳夫差的灭亡与越勾踐的复仇称霸。又此书內容基本上和《左傳》、《国語》、《史記》相同,但亦有《左傳》等三书所无而《吳越春秋》独有的;这些独有的材料就是关于占卜术数的部分,(占卜之詞非三代卜筮之法,术数則盛于两汉,非先秦所有,因而其史料价值甚屬可疑),以及类似小說家言的越女試劍、老人化猿、公孙圣的被杀及显灵等故事——这些故事也許是从会稽地区的民間傳說演化而来。赵曄后于司馬迁百余年。《后汉书·儒林傳》赵傳極簡略,不但未載赵之生卒年月,整篇連任何一个年号都沒有,但从“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郵,曄耻于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等記載,可以假定他生于公元二十年左右;因为同书《杜撫傳》說杜撫在接受驃騎將軍东平王刘蒼的辟召以前,已經有“弟子千余人”,赵詣杜受韓詩当在此时,而东平王辟杜撫約在永平初(即公元六〇年頃)。如果赵詣杜受业在公元五〇年左右,而此时赵年在二十至三十之間,則赵之生年当在公元二十年左右,上距司馬迁之死約为一百二十年。赵曄所見的有关春秋时代吳、越两国的文字資料不会多于司馬迁,但他既为越人,則他所知道的会稽地区民間傳說也許比司馬迁为多,这可以解釋《吳越春秋》所載的近似小說家言的故事为什么不見于《史記》。但是,研究了这些故事以后,我們也可以設想:司馬迁当时大概也曾知道有这些民間傳說,但因其或者沒有多大意义或者荒誕不經,故棄而不取。还可有第三种假說:民間口头傳說在十口相傳的悠久过程中,会損失一些,也会增添一些,新增添的部分往

往会带上时代的烙印；此所以《吳越春秋》所記伍尙、文种占卜之詞有騰蛇、青龙、玄武、天关等先秦所无的術語。这是假定赵曄的記載都有所本，并非他向壁虛造；但即使都有所本，其史料价值却很小，因为这些都不是吳、越当时的意識形态。元徐天祐因赵曄“去古未甚远”，又“越人宜知越”（四部丛刊影印明刊《吳越春秋》所載徐天祐为元大德刊本所写的序文），认为《吳越春秋》“視他书所記二国事为詳”，頗为贊賞，实亦皮相之論也。

司馬迁有良史之材，但“采經摭傳，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然而司馬迁叙述一个大事件，却总是首尾貫串，条理分明。《吳越春秋》范围限于两国，又有《左傳》、《國語》、《史記》可供借鉴，按理說，《吳越春秋》对于吳越大事件的叙述，应当胜于前三书。然而不然。《吳越春秋》的“疏略”、“抵牾”之处不但甚多，〔例如《閭閻內傳》末尾以“南伐于越”結束，而不記槁李之战、閭閻受伤而死等等；又如伯州犁（伯嚭之祖父）和郤宛本非一人，《左傳》記載十分明白，而《吳越春秋》則謂“伯州犁，楚之令尹，号曰郤宛”，既然把二人誤为一人，又給伯州犁加了“令尹”的官銜；又如《閭閻內傳》謂“是时大夫子期虽与昭王俱亡，阴与吳师为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即割子期心，以与隋君盟而去”云云，与《左傳》定公四年所記相反，好像赵曄曲解了《左傳》那句“割子期心”而又以意編造之。〕，而且它記述大事件常常綫索不清，来龙去脉不明，例如吳夫差征伐齐国这件大事是爭霸中原的重要步驟，而同时又是吳国終于失敗的重要因素；这件大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都反映了吳國國內實權集團的內部矛盾以及夫差如何最後作出決定，對於我們在今天正確評價夫差、伍子胥、伯嚭這三個人物有重要意義。但是《吳越春秋》記載這樣一件大事，卻砍頭、挖肚、去尾，極盡支離破碎之能事。“徵魯百牢”是吳夫差爭霸中原的整個計劃的第一步，（此事發生於吳夫差八年，魯哀公七年，公元前四八八年），表明吳國的爭霸中原派（伯嚭為首）怎樣地軍事、外交雙管齊下，對魯國施加壓力，企圖掃清伐齊的道路。然而魯國表面上屈伏了，內心卻不服輸。於是同年秋，當小小的邾國為魯國所破的時候，（邾與魯為鄰國，击柝相聞，吳遠在二千里外，非三個月的時間吳兵不能到達，）吳國借“仗義”救邾的名義，決定對魯用兵。（吳國動員伐魯已在下一年——即夫差九年的春季）。可是，吳兵雖然深入魯境，終于因為軍事上沒有絕對把握，只好見機行事，保全面子，同魯國訂了和約。這次和約，吳國並未取得實惠。同年（夫差九年，魯哀公八年）夏，齊、魯發生了糾紛，齊兵入魯，同時約吳國夾攻魯國。吳夫差認為這是好機會，可以達到完全掌握魯國的目的，自然又要動員。不料齊、魯很快就議和了，齊國派人告訴吳國：“請不要出兵了。”夫差很不高興，帶點威脅意味對齊國使臣說：“去年是貴國請我發兵，而今又是貴國說不需要了，真教我為難。日後我當面來領教罷！”這事發生於夫差十年春。吳國從上年伐魯取得教訓，知道勞師遠征，後方交通最為重要，因而在當年（夫差十年）秋就開凿運河，溝通江（長江）、淮（淮河），以利軍事物資的運輸。此即所謂邗溝，吳在此筑城為據點。〔查《吳越春秋》不載此事，而于艾陵戰役之後，黃池之會以

前，記夫差十四年復伐齊，“闕為闕沟于商、魯之間，北屬蘄（據《國語》當作沂），西屬濟。”——此承《國語》，《左傳》和《史記》均不載有此事。但全祖望引厚齋先生語，謂夫差十四年所開的運河為自淮入汴之道，與“城邗”時所開掘者是兩回事，——見《經史答問》。此說可以參考。）同年冬，吳國要挾魯國共同伐齊。這次，魯國不敢不答應了，（雖然它剛同齊國簽訂了和約），同時，伐齊的主要軍事負擔當然由吳國承當，魯國也樂得坐山觀虎鬥。夫差十一年春，吳陳兵于齊國南部邊境，却派舟師自海道進攻齊腹地，一戰不利，吳國也就收兵。次年五月，吳國（會同魯國）大舉伐齊，這次主要從陸路進攻，在艾陵會戰，吳國的右軍打敗了齊國的上軍，齊國的中軍也打敗了吳國的上軍，然而吳夫差親自指揮的中軍卻決定了戰局，大敗齊師，打死了齊國的中軍指揮官國書，並俘虜了齊國高級將領公孫夏等四人。艾陵戰役為吳國爭霸中原奠定了始基，然而也成為吳國盛極而衰的起點。大舉伐齊以前，吳國內部兩派的意見（以伯嚭與伍子胥為代表）是不同的，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然而促成夫差下決心大舉伐齊的諸因素之一，還有勾踐的麻痹夫差的策略，（他派了少數兵糧助吳，又親自到吳國都城見夫差，表示願隨軍出征），以及子貢的外交手腕。這些事情，見于《左傳》和《史記》，這裡不必詳細讲了。綜觀事件的發展過程，（從“徵魯百牢”到艾陵會戰），吳國內部爭霸中原一派的策劃還是相當周密和謹慎的，夫差也不是一個漫無主見、糊塗荒謬的人。當然，爭霸中原這件事，本身招致了不幸的後果，但在當時，哪一個強國之主不想做此一番“大事”？似乎也不能

苛責于夫差。(吳國在敗楚、覆越以後，已經是當時四強之一)。當然，我不是說夫差勢非爭霸中原不可，因而他的行動可以原諒；我只是說，從這件事的發展過程看來，可以證明夫差不是像後人所寫的那樣魯莽糊塗罷了。(從梁辰魚的《浣紗記》直到今天的若干《臥薪嘗膽》劇本中的夫差)。我以為我們應當還夫差一個本來面目，不必把他丑化；因為，還他個本來面目，就有教育意義，用不到再丑化他。

以上論吳、齊艾陵之役，不過借以說明《吳越春秋》的作者缺乏“史眼”；而且，這種缺乏“史眼”的毛病，又足以說明趙曄這部書與其作為歷史看待，還不如作為小說家言看待。當然，作為小說家的趙曄，（這是借用《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家”，不是我們今天說的小說家；據《漢書·藝文志》，則劉歆所謂小說家言者，相當於今天我們稱之為民間文學的一類，記錄此類材料的人和書籍，被稱為小說家），在採用民間傳說之時，也並未嚴為抉擇，因而它們不能反映春秋末年吳、越社會的意識形態，卻揉雜着很多兩漢術數家的意識形態；這也就是說，《吳越春秋》的內容，除已見於《左傳》、《國語》、《呂氏春秋》、《韓非子》、《史記》等等者而外，大部分沒有史料價值。

現在再談《越絕書》。這部書，隋唐志皆云子貢所作，宋人《崇文總目》承襲其說，明人（如楊慎）已疑之，清人始証其妄。查此書開頭《外傳本事》第一，設為問答之詞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嘆，決意覽史記成就其書。……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

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復載，或非其事，引類以托意。”這些話都隱隱約約說此書是戰國時人所作。可是此書末尾的《叙外傳說》則又以隱語指明作者為會稽袁康，校定者為同郡吳平，而且書中《吳地傳》又稱：勾踐徙琅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建武為後漢光武帝劉秀年號，然則此書作者袁康為後漢初年人，比《吳越春秋》的作者趙曄大約早生十來年，由此類推，此書或亦成于《吳越春秋》之前。但是，書中這些話雖然提供了作者、校訂者、成書年月的線索，我們却未便遽認為完全可靠。安知不是作者故弄玄虛？東漢的會稽人不少知名之士。王充可算得博極群書了罷，《論衡·按書》篇中提到會稽的兩個人，稱之為“文雅之英雄”，這兩個人一個名為吳君高，據王充說，曾著《越絕錄》，一個名為周長生，據說曾著《洞歷》。然而沒有袁康。（或疑吳君高即吳平，而《越絕錄》即《越絕書》，在未得確証以前，只能視作懸案）。又據《崇文總目》稱，《越絕書》舊有內記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才二十篇，可知此書在北宋初年已佚五篇，清人錢培名輯其逸文，但皆無關宏旨者。總而言之，《越絕書》來歷不明，但決非戰國時代的作品，大概出于東漢人之手。

再看《越絕書》的內容。可以說，它同《吳越春秋》百分之九十九相同。例一：《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記子貢游說吳、越后，“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台，忽昼假寐于姑胥之台而得夢”云云，此與《越絕書·吳王占夢》第六所記，只有文字上的小差別。究竟誰抄誰，我們自然無法